

文章编号: 1674-5205(2017)01-0040-(010)

《大明律》采六部体系编纂模式原因考辨

周东平¹ 李勤通²

(1.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湖南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大明律》采纳六部体系编纂模式的直接动因是明初刑律的普及需求。其三级结构中的篇、门从统、分两个视角勾勒出“主体针对性”,实现了官民之分、官官之分,从而使不同篇、门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向不同潜在犯罪群体。三级结构中第二级的二十九门体现出分的特征,突出了第三级具体法条与主体特征的关联性,第一级六篇则体现出统的需求。《大明律》普法目的源于朱元璋“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使传播刑律成为法典编纂的需求,也使其所面向的传播群体由司法官转向守法群体。普法需求与刑律编纂的正当性诉求共同塑造了新的法典编纂模式。

〔关键词〕大明律; 三级构造; 明刑弼教; 邱濬

Abstract: The direct reason why Da Minglv adopted the mode of "Six Departments" was the need of promulg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Pian and Men of the three hierarchies of Da Minglv outlined subjective pertinence from two perspectives, making clea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as well as officials and officials. In this regard, the different Pian and Men coul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diverse potential criminal groups.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three hierarchies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ision, which highligh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vis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in third stage, whereas the first stage showed the need of integrati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ith regards the adoption of the "Six Department" mode was that Zhu Yuanzhang carried the legislative thinking of Mingxing Bijiao. That urg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de, and altered the receiver of legal information from the judges to the law-abiding. The need of disseminating legal knowledge and the appeal to codify the criminal law altogether shaped the new mode of codification.

Key Words: Da Minglv; Structure of Three Hierarchies; Mingxing Bijiao; Qiu Jun

中图分类号: DF0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290/j.cnki.1674-5205.2017.01.004

法律条文在编纂过程中需要分类汇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领律典的纲目,统领纲目的结构就是法典编纂模式。《大明律》修订过程贯穿于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吴元年律、洪武七年律、洪武二十二年律与洪武三十年律^①。其中从洪武二十二年律开始,一种新的编纂模式——以“六部”为统辖的罪名体系^②(以下简称“六部体系”)出现。目前学术界有关二十二年律改弦更张的原因莫衷一是,致使许多教科书对这一问题存而不论,只论述其在编纂模式上的优缺点^③。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通过诉诸历史发展脉络,以古今变化来掩盖进一步考察的必

要。拙文通过对明初立法精神、立法实践基础等问题的考察,试图对《大明律》六部体系的形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对《大明律》六部体系成因的三种观点的评析

很多学者对《大明律》六部体系的成因已经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苏亦工在《明清律典与条例》中总结

① 参见《明史·刑法志》,转引自杨一凡《大明律修订始末考》,《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洪武年间的《大明律》有元年律、六年律、九年律、十八、九年律、二十二年律,以及三十年律。参见柏桦、卢红妍《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现代法学》2012年第3期。

② 部分学者采用这一称呼。如杨一凡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③ 比如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1页;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王申主编《中国法制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张晋藩等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等等。

收稿日期: 2015-05-19

作者简介: 周东平(1961—),男,福建省周宁县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李勤通(1986—),男,山东省寿光县人,湖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政治斗争说、立法思想斗争说以及他本人的仿《周礼》说。这些观点提供了研究基点,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一) 政治斗争说

政治斗争说源于沈家本。他认为,从洪武七年律到二十二年律的变化根源在于前者编纂于明初,当时“盖六部本属中书,故律书未尝以六部分”。⁽¹⁾²²⁰⁹但后者在修律之前,“迨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之政归于六部,故二十二年修律,亦分六曹,实时为之也”。⁽¹⁾¹³⁵⁴即政治斗争引发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又引发明律编纂模式的变化。

对此,苏亦工评析,六部体系早在吴元年律时就已经被采用,故二十二年律变化的根源应在洪武废相之前。⁽²⁾¹⁰这一批评不尽合理。吴元年律颁布于吴元年,政权草创,事业未成,元律于其时还有影响,所以采六部体系以应时事之需是很有可能^①。制定七年律时则江山开始稳固,统治者能够细致思考治国之策。且其时朱元璋首重唐律^②,故七年律“篇目一准于唐”。但若后来又因政治结构发生变化而重新回到六部体系,并非不可能。苏亦工的观点源于一种朴素历史观,即前后相继的事物之间必有因果关系。既然六部体系早已出现在元年律中,那么从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来看,二十二年律当然不可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这却将元年律与二十二年律六部体系的成因简单等同,故难以令人信服。

不过沈家本的观点仍值得商榷。第一,不能解释《大明律》二级结构分层的根本原因。政治斗争说只能解释六部体系,而对《大明律》整体结构的解释则流于表面,无法深入下去。从篇章结构来说,《大明律》采取了六部体系,但从整体来看,《大明律》是三级结构,即在最上层的第一级六官篇目与最下层的第三级具体律条间还夹着一层子目录(门),共二十九个(加上名例律为三十个),该第二级结构是《大明律》中颇有意义的分层,若按此说就变成无价值的随意分类^③。这样,整体性很强的六部体系就变成和稀泥,并导致“明律则顾此失彼者颇多”^{(3)卷26}之讥评。第二,与《明史·刑法志》所载立法理由“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的说明不符,这说明七年律本身的问题是修律的直接原因。修律显然是为解决断狱失当问题,而不是应对当时的政治变革。第三,吴元年律与《大明令》均采六官模式,洪武七年律虽改为唐律模式而《大明令》并未改变。从吴元年朱元璋的政治理想来看,“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

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⁴⁾⁴⁸⁷他嘱意周制,相比吴元年律,《大明令》显然与六官治世的政治理想更为接近。因此,《大明令》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才更说明问题。在十三年废相之前,《大明令》已可以应对废相后的政治结构,而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延续了这一模式。明律直到二十二年才抛弃唐律范本而直采六官体系,对回应政治变局殊无必要,且亦耽延。第四,无法对明初整个法律体系形成一以贯之的解释。从制度设计来看,刑律不过是刑部所掌律文而已。《大明令》中刑令下载有主要刑律条文,说明当时也认为刑律仅是整个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二十二年《大明律》颁行后不久,二十六年颁布《诸司职掌》,规定六部权限,这才是真正应对政治变革的法典。进一步来说,如果放眼全部法典,《大明律》不过是刑部掌管的部分法律。国外学者也认为我国古代“法律是行政的一个方面”。⁽⁵⁾³⁹⁸换句话说,《大明律》只构成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以政治斗争解释《大明律》,那么是否吏部等所掌律条也需要以六部体系予以重构?但实际上是《诸司职掌》以及《大明会典》等而非《大明律》更强硬地回应了洪武十三年的政治变革。

(二) 立法思想斗争说

也有学者认为明初立法时,出现了所谓立法思想斗争。“据史料记载,明初在制定大明律时,统治者就如何制定大明律曾展开过争论,丞相李善长等人主张‘今制宜遵唐旧’。而朱元璋则坚持制律应‘当适时宜’,坚持反对不顾客观实际,拘泥于古代成法,一概抄袭照搬的做法。”⁽⁶⁾而六部体系是合时宜的。杨一凡也认为,“《大明律》正是克服了‘宜遵唐旧’、‘是古非今’的思想影响,才在‘封建立法上迈出了新

① 如邱濬所言“盖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同一意也。”〔明〕邱濬《大学筌义补》卷103。按《明实录》的说法,吴元年“律准唐之旧而增损之,计二百八十五条:吏律十八,户律六十三,礼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明太祖实录》卷28(上),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影印,第422页。只是吴元年律至为简陋,且编排并不合理。

② 《明史·刑法志》载“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

③ 沈家本指出“明自律分六曹之后,《刑律》最大,《户》、《兵》次之,余三律皆少,故凡与此三律相牵及者,悉改入二律以充数。”如他指出官员袭荫即属于从唐之《诈伪律》改入《吏律·职制》充数的。参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7页。而现代学者对于大明律编纂模式的第二级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如侯欣一:《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杨一凡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而且按照沈家本的观点,很多相关律文安排就无法得到解释。譬如沈家本一方面认为由于六部体系使得《吏律》内容太少以至于不得不将其他律文纳入其中以充数,另一方面如《受赃》这一门却从《职制律》中析分出来放入《刑律》,这岂非自相矛盾?

的一步’。”⁽⁷⁾⁵⁶

这一观点同样存在问题。第一,这种说法过于宽泛而没有针对性。《大明律》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不仅编纂模式发生变化,而且立法主旨、具体条文、条文繁简等也有所改变。即使存在这种立法思想的变化,也很难证实它对编纂模式产生的具体影响。第二,这一观点假设明初立法中存在思想冲突,大臣与朱元璋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问题是朱元璋在明律立法中处于绝对中心地位,《明实录》载朱元璋“观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吾者,特以一己意见决之,而众辄以为然,鲜有持论”。⁽⁴⁾⁴²²因此,尽管李善长等负责具体操作立法过程,但把握立法精神的却是朱元璋本人^①,立法思想斗争说根本不能成立。第三,《明史·刑法志》载朱元璋于明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他对唐律评价甚高,所谓因时制宜必定是因今胜于昔才有改换的必要。但扬唐贬元时,《大明律》却最终采用了元律结构,这恐怕无法用今胜于昔来解释。

(三) 仿《周礼》说

苏亦工在批判前两种说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仿《周礼》说。通过对明代帝王治国理念的考察,他认为“在明代君王的心目中,唐代只能算是小康,其治法仍嫌简陋。要超越唐人到达理想的境界,何必舍西周而仿唐呢。”⁽²⁾¹⁰⁶《大明律》的六部体系正是朱元璋希望模仿《周礼》六官的结果。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周礼》所代表的礼治盛世是历代王朝的追求,非明代独有。“古代中国的儒家政治则以先王、圣人为法权依据,为最高法、理想法”,⁽⁸⁾²⁸⁵向往三代,改革汉唐,从宋儒开始就是共识^②。但“法先王”并不意味着《宋刑统》就要采取六部体系。西周政治理念与实践固然奠基了古代政治理想,但从来不是唯一。《唐六典》声称要承继周之正统并以《周礼》为范本,但《唐六典》的体例却不得不服从现实,《唐六典》也并未因此而具有法律效力。⁽⁹⁾祖述周制却存而不用是中国政治的常态。第二,苏亦工所引证之文献来自明孝宗的《御制明会典序》、明武宗的《御制重修明会典序》等。这恰恰证明仿《周礼》与《大明律》的编纂模式无关,与之有关的实际上是《大明令》、《诸司职掌》、《明会典》等行政法典。因为《大明令》、《诸司职掌》、《明会典》等才能规制整个明朝行政系统的职权,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充分体现模范《周礼》的特征。故该观点说服力有限。

不过,从学术传承角度来说,前事之鉴后事之师。固然政治斗争说、立法思想斗争说、仿《周礼》说都存

在问题,很难确定某个观点是导致明初实行六部体系的原因。但也有可能,这些因素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明律编纂模式的选择。尤其某些契机的出现,以至于立法者认为唐律十二篇的模式不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政治斗争后确定的政府组织模式则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传统的《周礼》正统恰恰能够提供满足新需求的制度框架,两者之间呈现契合状态。那么,立法者很有可能综合多方面的原因,以之为本,重构法典编纂模式。这样,六部的行政结构与《周礼》的正统思想,也就为明律六部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资源,新的法典编纂模式也可以满足政治正当性的诉求,从而,诸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大明律》六部体系的出现。不过,应该首先考虑究竟什么是六部体系出现的直接动力。

二、作为六部体系思想基础的明初立法精神

前述观点各有缺陷,首先在于没有将明初立法思想的变化与明律编纂联系起来。只有在理解明初立法思想转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思考明初立法的首要需求。明初的立法思想并未经历法古与适今的斗争,恰恰相反,其遵循着自始为一的实用主义立法思想——“明刑弼教”,法典编纂因此产生刚性需求——“普法”。正是这一需求对明律编纂模式产生了直接推动力^③。

(一) “明刑弼教”立法观念的确立

在儒家礼刑观念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于刑”。⁽¹⁰⁾陈宠传行为准则是礼而非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¹¹⁾为政另一方面,按照儒家观念,“不教而杀谓之虐”。⁽¹¹⁾尧曰:“百姓只有在教化不得后才能动之以刑,刑只是为辅助礼的实现而存在。尽管礼刑并用被认为是传统治国方略的通说,但在犯罪预防方面,古代主要强调礼的规范性和经济的基础作用。”⁽¹²⁾在教化观念下,“法律断无强人为善的力量,只

① 值得指出的是朱元璋在法古与适今之间持有非常明确的看法。〔明〕余继登《典故记闻》卷2载:“太祖初即位,中书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从后文中也可以看到明初并没有激烈的立法思想斗争,反而是秉承着始终如一的立法思想——明刑弼教。

②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87页。朱熹称“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以新的法典编纂模式来普及法律并非明律首创,至少宋代就已经有明确的意识。《玉海》卷66载《淳熙条法事类》的编纂理由为:“士大夫罕通法律,吏得舞文。今分门编次,聚于一处,则遇事悉见,吏不能欺。”

能消极地禁人为非,至多只能到达民免而无耻的程度”。⁽¹³⁾³¹⁰因此,“尽管司法实践中可能如司马迁、朱熹、谭嗣同批判的那样,儒家不一定占上风,但德主刑辅作为正统法律指导思想毕竟得以确立,并进而影响到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¹⁴⁾⁶⁰

相形之下,“明刑弼教”则意味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¹⁵⁾大禹谟儒家并不排斥刑罚的功能,但明刑弼教将刑罚作为教化的主要手段,与儒家的基本理念相违。宋代以前“明刑弼教”没有成为主流教化观念,统治者崇奉的是“德主刑辅”、“大德小刑”。⁽¹⁶⁾但经过朱熹的重新阐述,刑在统治策略尤其在犯罪预防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圣人之意,只为当时专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礼,所以有此言。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17)卷23}于是乎“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18)卷70}“德、礼、政、刑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指导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和谐统一的,从而改造了正统法律思想‘先德后刑’、‘以德去刑’等不切实际的思想。”⁽¹⁹⁾¹¹²故刑罚在犯罪预防中的功能被大大提高。

终宋之世,朱熹的思想只在南宋末年获得统治者认可,不久南宋灭亡。不过,朱元璋却继承了朱熹的这一思想,其统治策略十分重视“刑”在教化百姓中的作用,认同朱熹的明刑弼教观。朱元璋认为“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⁴⁾⁶³法律的价值由惩罚为主转变成以“卫人”的教化为主。结果,经朱熹改造后的“明刑弼教”在明初上升为主流法律思想。“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礼’。”⁽²⁰⁾¹⁷²

立法观的转变推动了法律功能认识的转变。“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²¹⁾⁴³⁶“惩之于已然,何如禁之未然;专事刑法,何如崇尚礼教”。^{(3)卷10}传统中由“礼”来承担的犯罪预防功能^①,明初则改由礼、刑共担。“礼与法(教化与刑罚)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某种游移,彼此之间也出现了意义和功能的交换。”^②在传统礼刑观下,刑律与百姓生活关系并不密切,但出自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深知要维护底层的稳定,需要明确而详尽的刑法。刑律的作用就从“出礼入刑”的惩罚功能转变为“使民远罪”⁽²²⁾⁵⁵的预防功能。于是朱元璋采取重典治国、明刑弼教的策略,希望通过重刑使民顺从国家教化。⁽²³⁾而刑律的预防功能与刑律传

播存在密切关系,欲使之守法,必先使之知法。这就产生了刑律的传播需求。

(二) 司法之法向守法之法的转变

本文所称司法之法与守法之法是从传播对象上来对刑律进行的分类。在西方,有所谓法官法,主要指法官造法,与之相对的则是制定法。两者的划分标准是法律的制定主体以及权力来源。而司法之法指的是,刑律的传播对象是司法官,它是为约束司法官而存在的。对民众而言,他们的行为标准主要在“礼”,守礼就可以做到不违法。所以刑律与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的联系并不大。与此相对,守法之法则意味着刑律的传播对象开始面向更为广泛的民众,通过直接影响民众的日常行为来显示自身的存在。明初《律令直解》初定时,朱元璋直言“吾民可以寡过矣”。^{(24)刑法志}显然这是一部以普法为中心的法典,其传播对象为普通民众。对《大明律》而言,它的传播对象是同样广泛的守法群体。

现代法理学认为,法律的功能包括告示、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²⁵⁾⁸³法律功能是多元的,但德主刑辅的观念却使得“刑法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和功能有限”。⁽²⁶⁾⁵⁶⁰明刑弼教观念则使得刑律的主要功能从强制变成预防。正是法律功能的不同预设促成统治者对刑律传播态度的差异。在“德主刑辅”观念下,法典的普及需求不会太过强烈。如《晋书·刑法志》记载《泰始律》的法律宣传不过是“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无论法律的传播途径还是传播内容都无法与明代相比。粗略看来,历代王朝编订刑律除辅助礼教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27)刑法志}所谓革人视听是为了表示政权的合法性。⁽²⁸⁾第二,官吏滥用刑罚,刑狱太多,民众动辄触犯刑律,导致社会不安定。唐高祖有云“有隋之世。虽云釐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深浅,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釐革,卒以无成。”^{(29)刑法志}说白了,《武德律》修订的直接目的是约束司法官,推动定罪量刑的统一,实乃为满足司法之需要。尤其隋唐以后科举取

① 在我国古代的犯罪观之下,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儒家的综合治理思想,在该观念下礼的教化才是犯罪预防的核心手段。参见艾永明《中国古代犯罪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春季号。

② 徐忠明《明清国家的法律宣传:路径与意图》,《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徐忠明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是国家意图之外的意外结果,但从明初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来看,这显然是统治者试图通过普法所获得的当然效果。

士的官员们,大都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司法之法所面向的群体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他们对律典在行文的简洁和结构的明晰等方面的需求都没有那么强烈^①。与此相反,其他群体的素质相对较低,守法之法就对律典的行文与结构产生简明易懂的诉求^②。这一点明律表现得非常明显,也进一步指向了它所试图规制的传播群体。

薛允升曾说“明律虽因于唐,而删改过多,意欲求胜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远甚也。”⁽³⁾例言他并未认识到立法思想的转变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转变,从司法之法向守法之法的转变当然也会引起法典的相应转变。《大明律》的修订同样遵循这一规律。除去法律的内容简明之外,如何在法典的结构中进一步体现普法需求也成为法典编纂模式变革的内在因素。有针对性地面向潜在犯罪群体这一基本方针成为新的法典编纂模式应对这种需求的重要手段。

三、作为六部体系实践基础的元、明初行政管理经验

尽管朱元璋确立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但并不意味着其法典编纂能如空中楼阁般地建构。范忠信认为,传统法典的传播存在缺陷,导致在明代之前普法比较艰难。⁽³⁰⁾守法之法的编纂需要的不是一种亘古绵延的礼教思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典传播经验。由于明以前的政府大多秉承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缺乏迫切需求的法典传播经验。沈家本认为,明以前的刑律编纂模式或为尊王或为重民。⁽¹⁾1360-1361但尊王、重民都是相对空泛的合法性观念,与法典传播的现实需求并无联系。由于我国古代行政管理异常发达,⁽³¹⁾行政管理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转化成法典传播经验。如何更加有效地加强行政管理与如何更加有效地传播刑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毕竟地方官吏的行政管理与民众的联系最密切^③。从职官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各官皆有所职事所属之法”⁽³²⁾⁹⁴是基本模式。执掌不同行政管理事项的官员就执掌着不同法律。法律是官员行使权力的依据与工具。对统治者来说,通过官吏与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仅是手段的差异,两者在与不同社会群体接触的路径上则为一致。配置了官员也就配置了法律,进而也就控制了法律制约下的不同群体。

究竟《大明律》六部体系在什么意义上借鉴地方官吏的行政管理经验?《元典章》提供了范本。苏亦工以朱元璋“元代不可法”来反驳《大明律》与《元典章》之间的关系,但内藤乾吉早就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④。而从制定与颁行来看,《元典章》显然与

地方行政管理存在着密切关系。《元典章》附录二《原书纲目及目录》载“准江西奉使宣抚呈‘乞照中统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编集成书,颁行天下。’照得先据御史台‘比及国家定立律令以来,合从中书省为头一切随朝衙门,各各编类中统建元至今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条例,置簿编写检举。仍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司体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致废弛。’”⁽³³⁾2287即宣抚遵照御史台要求,命所属衙门将有关各自衙门事项的法令编纂成册,汇集起来呈给皇帝,后来随之颁布施行。故《四库全书》称《元典章》“乃吏胥钞记之条格”。⁽³⁴⁾卷83因此,《元典章》的编纂体例是以地方行政管理经验为参照,是官员配置与法律配置关联起来的范例。尽管朱元璋轻视元代立法,但对《元典章》这种经验性产物终究不能视若无睹。将行政管理经验与法典编纂模式联系起来,是缺乏法典传播经验的选择。另一方面,行政管理的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推定为法典传播的有效性。一旦明初最终确立六部制度,《元典章》的编纂经验就会再次成为参考项。

同时,明初又特别强调各级官吏对于律令的掌握,这种掌握并非仅限于审判意义上,而是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官吏的日常行为规范。讲读律令从洪武初年就已经开始^⑤,且直接规定于《大明律》中。《大明律·吏律·公式》中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

① 如唐律便是言语流畅优美,但又不免晦涩难懂。参见侯欣一:《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② 如薛允升指出明律将唐律中深奥难懂的一些词句“俱易以平易浅近之语,若有不得其解者,则决然删除”,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普法的要求。参见(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首”,怀效锋、李鸣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应当指出这种地方性的法典编纂经验源远流长,如初山明认为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就是地方官吏为了管理方便,而从现有律令中抽离出来,分门别类重新整理组合的。参见(日)初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李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这说明实践性很强的法典编纂方式不是要遵循某些普遍价值观,而是要迎合行政管理的特点。这也形成法典传播的雏形。

④ 内藤乾吉的研究主要针对吴元年大明律令与元典章。(日)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 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0页以下。实际上,内藤湖南早已发现宋元交替中存在的巨大划时期性。大庭修也指出:明律是由《名例律》和六部分篇组成,并且此后以行政官厅类别为基础编纂的《会典》,与元代《元典章》的出现、皇帝的命令形式的变化如出一辙。参见大庭修《律令法體系の變遷》,《泊園》13(后以《律令法體系の變遷と秦漢の法典》为题,收入《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年版;德永洋介《宋代中國の法と刑罰》,载于日本《中國史學》第21卷,2011年10月。

⑤ 《明会要》卷十四“礼九”载洪武五年“诏天下行乡饮酒礼……读律令,则以刑部所编申明戒谕书兼读之。武职于每月朔日,以大都督府所编戒谕书率僚佐读之。”可见明初不仅开始讲读律令,而且讲读律令要根据职官的不同讲读不同的内容。

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处考校。”问题是“其视通晓律意之人,与习业之天文生相等,总以见此事之最难,而能讲解者之实不易得也”。⁽³⁾卷10 这种情况在清代也同样遇到过。清代《钦定吏部则例》载,当时吏部因律文繁杂,呈请乾隆皇帝删去讲读律令一条,但乾隆皇帝认为“朕思律例有关政治,即以司官而论,若谓各部律例未能尽行通晓则可,若于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办理事件徒委之书吏之手,有是理乎?”⁽³⁵⁾193 因此,按照官吏的不同职能来讲读律令是最有效也是最现实的,完全记诵恐欲而不可求^①。洪武十三年以后,六部成为国家主要行政运作模式,则六部分工需要行政运作规范化,需要在六部运行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尤应注意的是,明初沿用元代人户以籍为定的制度,主要分为民、军、匠三种,不同的户籍承担不同的赋役种类,并且民籍由户部管辖,军籍由兵部统领,匠籍由工部管理,户籍不允许变动^②。六部模式不仅是行政运作模式,也是户口管理模式,不同人户需要遵循的法律也有很大的不同,管理机构与户口之间通过不同的法律条文被联系在一起。六部、对应六部的法律、人户管理这种内在结构从行政管理角度来说,是最有效率也是最有经验可循的。

因此,《元典章》的六部体系和六部改革后的普法现实提示了法典编纂模式与六部体系的经验联系。六部体系既是一种历史经验,也是一种现实需求。当然,这是在明初“明刑弼教”立法思想推动下产生的。它使六部体系成为新法典编纂模式的合理选项。

三、六部体系编纂实践的前奏与直接原因

六部体系在普法方面的优势具体在于,律典篇、门的分类标准可以是该篇、门所对应的不同潜在犯罪群体,这就使律典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为相关群体所了解,从而使该群体能从自己的行为上予以遵守。人们只需要关注与自己身份有关的律条就可以做到守法。这是十分有利于提高普法效率的做法,也是明初立法实践中的常见经验。

(一) 前奏:《律令直解》与《大诰武臣》的探索

明初朱元璋为普法,命大理寺卿周枬等将吴元年律与《大明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视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²⁴⁾刑法志 尽管这部普法典籍并未留下任何篇目,但仍值得反思。要想让民知所避就,必须普法,但普法并不意味着百姓需要把所有律条熟记于心,而是要根据潜在犯罪群体的身份、所处理事项的

差异等依据,有针对性地对法典进行普及。所以礼乐、制度、钱粮、选法被专门归类、宣传,其编纂面向所规制的群体以提高普法质量^③。这种法典编纂乃是分析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犯罪特点,就他们可能涉及的犯罪类型做出有针对的汇集整理。

明初对官员的普法实践也很能说明问题,最具启发性的当是《大诰武臣》。朱元璋在《大诰武臣序》中指出“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这书与管军的人造福,不是害他的文书。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要问罪。”⁽³⁶⁾427 可见《大诰武臣》直面的特定规制对象——军人及其子孙家人。针对这些军人及军属的特点,法典做出有针对性的汇集整理,并将这些规定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力普及,以保证它们能够得到遵守。而军户籍的稳定性也保障了守法群体的稳定,这对法律普及的效果颇有助益。

明初的《律令直解》、《大诰武臣》等有几点有益提示。第一,这两部法典都颁布在二十二年律之前,前者在吴元年,后者在洪武二十年,它们都可能对《大明律》普法功能的特点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统治者对法典编纂模式与法典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这种法典传播影响法典编纂的观念在明初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观念^④。第三,法典传播需要根据潜在犯罪群体的不同进行析分,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作不同规定,以保证相应群体能够对自己所应该知晓的律法有更好的掌握。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的划分,首先是百姓犯罪与官员犯罪的划分,其次是这两者内部各自的划分。

(二) 直接原因: 邱濬对二十二年律编纂的解读

邱濬的著作为研究《大明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① 比如清代官员认识到准确断狱需要熟读诉讼、断狱两门。参见张晋藩《明清律“讲读律令”的启示》,《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详细内容参见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华东政法学院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卞利《明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③ 在一般民众的法律普及中,这种有针对性的普法活动具有相当强的实用性。例如明代中后期官府为了解决土地纠纷与土地盗卖犯罪,就通过一种有针对性的法律普及予以应对。参见龚汝富《明清时期的法律传播与法律教育》,《光明日报》2003年9月9日。

④ 值得注意的是明宪宗成化和明孝宗弘治年间编纂的《皇明条法事类纂》在《名例》一篇下有专门的《王府条例》目。参见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以下。其特色非常鲜明,集中体现明代法律编纂过程中针对潜在犯罪群体的特点。即针对王府中的人犯罪的情况作出专门的规定,十分便利相关人员的普法和遵守。

但其中还有值得重视而未受重视之处。邱濬记载：“其(笔者按：指洪武七年律)后以其比类成篇，分合无统，复为厘正，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析十八篇以为二十九。”^{〔37〕卷103}但《明史·刑法志》记载二十二年律的时候，指出因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故二十二年律是“取比年所增，以类附入”。两相比较，可知有以下几个不同：

第一，邱濬所谓的“比类成篇”，到《明史·刑法志》则成为二十二年才开始的“请编类颁行”、“以类附入”，而且在邱濬看来正是“比类成篇”导致“分合无统”这一后果。按照一般解释，“取其比年所增，比类附入”的意思是“就近几年陆续增添的条例，取其可以作律的，分类入律”。^{〔38〕16}据此，则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成篇”情况。“成篇”有两种可能：其一，新入律的条文构造了新篇目；其二，在加入新篇目时对既有条文进行整合，扩大了篇目。

第二，按照邱濬的说法，成篇的结果就是二十二年律编纂之前的《大明律》为十八篇，而不是仿唐律的十二篇。这在《明史》中没有记载，笔者也没有发现关于这十八篇的其他记载。不过扩充为十八篇的明律却由于篇目的增加，更可能出现“分合无统”问题。

邱濬的说法是否可靠？笔者认为可靠。首先，邱濬的说法与《明史·刑法志》之间并没有根本冲突，只是《明史·刑法志》记载的内容更少而已^①。其次，邱濬所言十八篇尽管没有留下名称，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如柏桦等认为，在洪武九年通行的明律中很可能有“奸党罪”这一罪名，包括洪武二十二年律中出现的“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三条^②。尽管洪武九年律没有传世，但这种以数个条文组成同一罪名的现象极有可能是以成篇的结构出现，这样也更能应对当时的政治内斗，这种猜测也与明初法典编纂思路相一致。再次，根据沈家本所考，二十二年律的二十九门中至少有十门即约三分之一属于明律新设的，包括《公式》、《田宅》、《课程》、《钱债》、《仪制》、《邮驿》、《人命》、《骂詈》、《营造》、《河防》。^{〔1〕1356}目前无法考证这些门类是否始自二十二年律，但从二十二年律之前就已经出现十八篇的说法来看，某些门类很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出现。最后，就《大学愆议补》而言，《明史·邱濬传》载“表上其书，帝称善，赏金币，命所司刊行。”^{〔24〕}该书既然得到皇帝首肯并颁行天下，则出现像把明律从十二篇改为十八篇的大谬几乎难以想象。更何况邱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对于律法沿革本就造诣颇深，且作为明中

期重臣，去洪武未远，自当明白明律篇章结构而能够准确记述。

如果邱濬记述无误的话，那么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大明律》的六部体系并不是为适应新出现的废丞相兴六官的政治变革，而是为了应对当时刑律扩张，篇目已经超出仿唐律的十二篇，以致出现的分合无统、法无定式之局面。之所以出现十八篇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使新入罪名能够更容易传播而有针对性地编订了新的篇目。第二，《大明律》修订的目标是“吏知所守而不眩于烦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37〕卷103}重修《大明律》是为了让官吏和民众都能够更好地遵守刑律，说明修订刑律的宗旨已经发生变化，如何传播刑律成为立法者必须思考的内容。第三，《大明律》之所以采取六部体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使法律能够更容易被人所知悉。所以，吏户礼兵刑工的分类是为调和十八篇被迫做出的回应，同时起到重新统领整个法典的功能，加强了普法效果。

四、六部体系普法功能的实现路径

普法是六部体系的动因，那么六部体系又如何推动这一功能的实现？它主要通过解决邱濬所谓“分合无统”问题来实现。从法典传播的角度讲，二十二年律的分合现象表现出一种很强的主体针对性，即针对不同的潜在犯罪群体之最可能的犯罪行为做出有

① 该说法与学界关于二十二年律之前的篇章结构的一般看法存在差异。如黄彰健认为二十二年律之前，《大明律》的篇章结构实际上与何广所著《律解辩疑》的结构是一致的，而《律解辩疑》的结构却是与三十年律相同。这显然就与邱濬的说法存在直接矛盾。但根据版本学的研究发现，《律解辩疑》的结构乃是后人在传刻该书时重新编纂的结构，甚至出现朱元璋死后才有的“太祖高皇帝”这样的追谥文字。也就是说，尽管《律解辩疑》的内容可能是洪武十八、十九年的行用律，但其原始的编纂模式却可能并非如此。所以现存《律解辩疑》的结构并不能给邱濬的说法造成威胁。参见黄彰健《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究》，《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8页以下；张伯元《〈律解辩疑〉版刻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另外，宫泽知之亦指明，现存何广《律解辩疑》的刊刻时间迟于洪武时期，特别是何广的注与所参照的律之本文并不是同时期的。见宫泽知之著《何广〈律解辩疑〉与明初的律》，载（日）森田宪司《13、14世纪东亚诸言语史料的综合研究——元朝史料学的构筑》，平成16-18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所收。转引自（日）富谷至编《東アジアの死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年版，第65页。

② 参见柏桦、卢红妍《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现代法学》2012年第3期。柏桦等同样认为《大明律》从九年律减为446条以后实际上再到十八、十九年律的律文一直是增加的，这就为篇目的增加提供了前提。而孙星衍《重刻唐律疏议序》曰“自唐永徽定律以后，宋元皆因其故。惟明代多有更改，又增奸党一章，以陷正士，而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或言轻罪愈轻则易犯，重罪加重则多冤，非善政也。”其称《大明律》“奸党”为一章，或包括上述三条，值得深思。

对应性的总结和梳理^①。这一判断是基于对《大明律》三级结构的具体分析而得出的^②。

(一)《大明律》第二级结构所见“分”之特点

所谓的“分”并非乱分,而是根据潜在犯罪群体的差异进行析分,也就是析十八篇以为二十九门。它首先区分百姓与官员的犯罪,其次再就各自内部进行区分。兹举三例。其一,析分《杂律》。王立民认为,由于唐律过分注重崇古,所以兜底性的《杂律》中很多内容都可以析分到其他篇目中。⁽³⁹⁾⁴³比如《公式》门类下的“弃毁制书印信”在唐律中属于《杂律》。该律文专门适用于官员犯罪,与现在的职务犯罪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一般情况下只有官员才有能力触犯该罪,所以该条被放到《公式》中。普通百姓不具备官职,当然违犯的可能性不大。《杂律》中诸如此类者甚多,最终唐律《杂律》的六十二条变成明律《杂犯》的十一条,大部分进行了重新分类。其二,析分《诈伪》^③。例如“官员袭荫”,明律《职制》中“官员袭荫”条,在唐律中列于《诈伪》。沈家本认为该条文之所以列于《职制》门类下,是因六部体系的变化而不得已采取的充数行为。⁽¹⁾¹⁸²⁷⁻¹⁸²⁸但若仔细分析,会发现它之所以被列于《职制》中,原因正在于其犯罪主体主要是官员,官员以外的其他人员一般很难犯下这一罪行。其三,析《厩库》为《仓库》和《厩牧》。如果说前两种分类体现百姓与官员之别的话,那么这一析分则集中体现官员与官员的差异,也就是官员内部的划分。这两门是从唐律《厩库》析分出来的,仔细对照会发现对这两者的析分主要以潜在犯罪对象的不同职位为依据,即唯有管理仓库的人才能触及《仓库》律,同样,唯有管理厩牧的人才能触及《厩牧》律。侯欣一认为“明律在篇内也是按照犯罪行为将性质相同的条文同类相聚,并明示之。”⁽⁶⁾但反过来,不同性质的犯罪同样类型化了犯罪人员,即在不同情形中潜在犯罪群体是不同的,犯罪类型化处理能够提醒该职位的人守法。

《大明律》第二级结构“分”的特点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传统法典编纂中的篇章结构主要重视罪行之间的性质(客体)差异,从《法经》的盗、贼、亡、捕、杂诸篇到《唐律》的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一篇,莫不如此。相比之下,《大明律》的篇章结构更为复杂。在综合犯罪主体的基本特征之后,《大明律》的第二级结构还可以细化为三种不同的分类标准:犯罪行为的特征、犯罪对象的特征,以及犯罪主体的特征。

兹列表如下:

	吏	户	礼	兵	刑	工
犯罪行为		户役、 田宅、 婚姻、 钱债	祭祀		贼盗、 人命、 斗殴、 骂詈、 诈伪、 犯奸	
犯罪对象		课程				河防
犯罪主体	职制、 公式	市廛、 仓库	仪制	宫卫、 军政、 关津、 廐牧、 邮驿	诉讼、 受赃、 捕亡、 断狱	营造

以上为《大明律》中二十八门的分类。其中,以犯罪行为为划分标准的有十一门,以犯罪对象为划分标准的有两门,以犯罪主体为划分标准的最多,有十五门。另外,《名例律》四十七条未分门,《刑律》中的“杂犯”门无法放入其中。

同时需要注意,由于律文很多时候可以多角度解读,我们并不能确定分门原因的单一性,所以同门中条文混杂的现象也非常明显。以“祭祀”为例,总共六条。其中“祭享”、“致祭祀典神祇”两条是专门针对祭祀官员提出的规范,“毁大祀丘坛”、“历代帝王陵寝”两条是专门针对特定犯罪对象的保护;其余两条“褻渎神明”、“禁止师巫邪术”则没有特定的主体和对象。但这六条又都与祭祀有关,故可暂列入犯罪行为的分类中。又如“捕亡”,总共八条。其中“应捕人追捕罪人”、“稽留囚徒”、“主守不觉失囚”、“贼盗捕限”四条主要是针对追捕以及管理囚徒的官吏提

① 法典传播过程中这种主体针对性十分重要。例如雍正二年的上谕指出“刑部 朕披览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杀、谋杀者尚少,而以斗殴伤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争,或因微物启衅,挥拳操戈,一时殒命。及至抵罪,虽悔何追。此皆愚贱乡民不知法律……今将大清律内所载,凡殴杀、人命等律,逐条摘出,疏解详明,尔部可通行各省,令地方有司刊布,散布于大小乡村,处处张挂,风雨损坏,仍复再颁。”马建石、杨育寰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这也说明法典的编纂与传播,必须根据传播对象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回应,以保证自身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② 刑律的三级结构并非明律首创,如《宋刑统》就采取篇、门、条的三级结构。但《宋刑统》有213门,设门的主要标准为同一犯罪行为下的不同情形。比如《杂律》“失火门”有“仓库内不得燃火”、“非时烧田野”、“故烧官舍宅、蚕簇、五谷财物积聚”、“见火不告不救”、“水火有所损毁”等五条,均为失火的不同情形。这种分类模式与《大明律》的29篇分类模式有明显的差异。

③ 薛允升指出从律文的性质来看,均属于诈伪,无论是什么人诈伪都摆脱不了诈伪的共同特征,那么也就必然应该将之纳入同一篇目之下。这是从纯粹的性质上来分析。但是,如果从不同主体的犯罪而言,那么不同的主体就可能犯下不同的诈伪罪行。如官员可能会作为官文书增减,一般百姓则不会犯下这种罪行。

出的规范“罪人拒捕”、“狱囚脱监及反狱在逃”、“徒流入逃”三条则主要针对在押囚犯“知情藏匿罪人”则没有特定对象。除“知情藏匿罪人”外,“捕亡”囊括了以监狱为空间中心的潜在犯罪主体,应当说具有很强的主体针对性。而像市场、仓库、关津、宫卫、厰牧、邮驿、断狱等更为明显。所以上述分类总体上还是比较合理。

毋庸讳言,诸如此类大分、细分的结果,使《大明律》的篇目显得极为庞大,达到二十九门之多,由此产生“统”的需求。

(二)《大明律》第一级结构所见“统”之特点

所谓“统”是按照二级结构的特点进行统合、整理。《大明律》二十九门的庞大二级结构,使得整个篇目显得零散不堪,不得不重新进行分类整理。而分类也必然遵循一定规律。六部体系在形式上符合《周礼》的六官制度,在本质上又能根据不同的行政事项面向不同群体,从而使得在对某一潜在犯罪群体进行法律宣传时具有针对性。第一级结构的“统”同样体现出官民之分与官官之分。兹举三例。其一,一般民众犯罪被集中在《刑律》与《户律》之中^①。其他如《吏律》、《礼律》、《兵律》中,有的根本不存在,有的较少存在。这样,一般民众犯罪就有了针对性的篇目。第二,《工律》的独立。《工律》的法律条文殊少,仅包括《河防》、《营造》两门,主要针对的是工匠群体,将其容易违法的法律统合起来。在明初户籍制度下,工匠群体保持着稳定性,所涉及的法律又具有很强的专门性,故将之统合于《工律》中,法律与守法群体有了直接的对应。其三,《兵律》的统合。《兵律》包括《宫卫》、《军政》、《关津》、《厰牧》、《邮驿》,它将杂散于各处的军事方面的规范全部统合起来规定于一处,集中应对军官以及士兵犯罪,体现军人犯罪的特殊性。从表面上看,第一级结构的分类仅仅是按照其所对应的不同国家行政职能进行编排,进一步看,则可意识到其实际上面向不同行政领域内的潜在犯罪群体。

六部体系在传播上较之以往的好处在于,它适应了自上而下的官员管理体制。行政管理的方式在于上令下达,在这个过程中行政职权也进一步地析分。这一点在《兵律》以及第二级门目的分合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整体来说,《兵律》对应整个军事部门,但从二级结构来看,又分别针对不同的军事职能机构。法律是自上而下传播的,那么六部体系的三层结构也适应了行政体制自上而下的变换,这使得法律的每一部分在主体的对应上都有其特殊性。如此,法律传播的效率与效果也就能有大幅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从《大明律》的一级和二级结构来看,明律编纂方式存在根据潜在犯罪主体的不同特点提出警告的特征。由于明代官员有讲习律令的职责,所以什么职权的官吏讲习什么样的律令也应该有针对性地掌握。无论对宣讲者还是被宣讲者,有针对性地讲读律令比整体性地讲读律令必然更有利于普及。《大明律》在整体上就体现出这样一种作用,而六部体系则在其中起到“统”的重要功能。洪武三十年五月《御制大明律·序》称“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特敕六部、都察院官,将《大诰》内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御制大明律·序》对应的三十年律之律文在二十二年律中已经基本确定。⁽⁴⁰⁾¹⁸三十年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律诰附于律文之后。而《御制大明律·序》明确指出将律诰附于律文之后的原因是想改变律诰“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的情况,说明《大明律》的普及需求及其效果是得到承认的。当然,也要注意古人的逻辑水平及时代局限,而且很多事项的性质本来就很难绝对划分到某一篇目中。所以六部体系有着对普法需要的倾向,但并非所有分类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综括上述,《大明律》六部体系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需求,而且与朱元璋的观念存在直接联系。规则本质上是形式的,因此法律从本质上是形式的,法律与专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分离。朱元璋正是通过这种法律形式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这就必然要求法律与民众生活之间产生更进一步的密切联系。《大明律》也必定要对这一观念进行反映。其实,在《大明律》的制定中,这种倾向之显著大大超乎过往。洪武二十二年律制成时,律典前列有《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服制》和《例分八字之意》等图表,将仍嫌繁复的文字表述具象化,以使百姓周知,这是历代法典所无,也是打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的切实措施。落实到法典上,就是法典必须能够通过最合理的方式为最需要的人知晓。《大明律》六部体系的三级结构顺应了这种法律普及需求。而在古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中,新制度的创立往往需要祖述传统,寻求正当性基础。六部体系恰恰又与儒家推崇的周制及明初新的行政模式等制度资源存在内

^① 值得注意的是《受赃》在《刑律》之中的规定。本来受赃基本是官员的行为,而且不仅仅是司法官的受赃,故唐律分属《职制律》,但在明律中却被普遍性地规定在《刑律》中,分属可疑。但我们如果想到受赃其实是对合犯,必有送赃等一般主体的行贿人与之对应,尤其朱元璋面向全体民众宣传《明大诰》,而《明大诰》的主要内容就是惩罚官员受贿之类,就可以释疑了。

在契合。因此,六部体系就承担了双重职能——普法 都得到实现。
和正当性证成,直接动因与正当性诉求在六部体系上

参 考 文 献

- (1)〔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 (3)〔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4)明太祖实录(Z).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卷影印.
- (5)〔美〕琼斯.大清律例研究(M)//苏亦工,译.高道蕴,等.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6)侯欣一.唐律与明律立法技术比较研究(J).法律科学,1996(2):83-87.
- (7)杨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 (8)俞荣根.“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法(M)//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 (9)钱大群,李玉生.《唐六典》性质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9(6):189-204.
- (10)〔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1)黄怀信.论语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2)程维荣.我国封建社会犯罪预防初探(J).法学研究,1985(1):77-82.
- (1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4)郭建,等.中国法制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15)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6)陈应琴.“明刑弼教”思想的渊源、发展及其运用(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8-22.
- (17)〔宋〕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19)马小红.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20)曾宪义,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21)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2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3)杨一凡.明大诰与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18-26.
- (24)〔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5)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6)陈晓枫,等.中国法制史(下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27)〔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8)陈涛,高在敏.中国法典编纂的历史发展与进步(J).法律科学,2004(4):107-116.
- (29)〔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0)范忠信.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及其主要特征(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23-27.
- (31)艾永明.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J〕.中国法学,2004(1):152-160.
- (32)陈晓枫,等.中国法制史(上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33)元典章(M).陈高华,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 (34)〔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5)钦定吏部则例(一)〔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 (36)杨一凡.明大诰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 (37)〔明〕邱濬.大学愆义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 (38)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 (39)王立民.唐律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40)杨一凡.洪武《大明律》考(M)//杨一凡.《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六卷《历代法制考·明代法制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本文责任编辑 何柏生)